

隨州文物



# 随州文物

资料选编

(一)

随州市文物局  
随州市博物馆

合编

一九八五年八月



# 前 言

李文烈

随州历史悠久，据史籍记载：“随于上古为列山氏”。相传是神农耕耨之乡，又云：“神农故乡”。西周为随国。自秦汉之后，为郡、为州、为县，建置不一，而随之名，历久未易。

从文物发现来看，一九五七年六月，在随州城西北约五公里的一带，有旧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用石英、石片打制而成的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在三里岗、均川、浙河、安居、唐镇、万店、淮河、小林等地。商、周时代的文物都有发现，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出土更加丰富。

一九七八年夏季，随州市擂鼓墩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其规模之大，建筑形式之奇，堪称举世罕见。出土文物达7000余件，尤其是“编钟”重约五吨（包括钟架）多达六十五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随州誉为“古乐之乡”，“文物之邦”。因此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纷纷撰写论文，著书立说，研究探讨随国历史，并对随国、曾国提出异议。有的史学工作者，以一九七九年四月，在随州城东季氏梁出土的两件戈为例，论证曾就是随，指出这个曾国，不是姒姓，而是姬姓。

从文献记载来看，在春秋时期，随与楚是时而敌对时而媾

和。《左传》“季梁谏追楚师”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随，随侯听了贤臣季梁的话，作好了准备，楚军不致进攻。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楚再次伐随，虽获胜利，但未能占领随国，只结盟而还。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死于军中，由大臣们与随侯结盟。春秋诸侯林立，战火连续不断，自公元前706年到公元前690年，在这十六年中，楚对随国进攻了三次。过了五十年，即鲁僖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随国率领汉东诸侯叛楚。

楚昭王奔随，随楚之间，改变了敌对的局面，开始了友好的交往。《左传》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大军在孙武，伍子胥指挥下，屯兵于随国之西南，使人致书于随侯，书中云：“周之子孙，在汉川者，被楚吞噬殆尽。今天佑吴国，问罪于楚君。若出楚珍，与吴为好，汉阳之田，尽归于君。寡君与君，世为兄弟，同事周室”。当时楚昭王隐匿在随国公宫以北，吴军进抵公宫以南，局势极为危急。随侯不顾吴国的威胁和利诱，拒绝交出楚王，终于赢得了时间。楚王在秦国的帮助下，恢复了楚国。然而在“曾侯乙墓”中，发现铸钟上有铭文：“佳（唯）王五十又六祀，楚王禽（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据考证，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赠送给曾侯乙的厚礼，以此说明曾侯乙是随侯的后裔，正是报恩之意。尽管如此，但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看法，随、是随国，曾、是曾国。对于“曾国之谜”有待于史学工作者、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解决。为此，特将有关论文资料，选编为《随州文物》作为不定期的刊物，陆续出版。这既是迎接楚史研究学会在随州市召开。

鞭策我们的工作，指导我们的工作，又是研究随州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随州历史的发展，随州历史的研究，最为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曾侯乙墓的“编钟”震惊中外，而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在香港展出，更是轰动了世界。我市从事随史研究的工作者，产生一种强烈的要求和愿望。深感向读者介绍随州历史，借以引起读者对随州历史的重视，是我们在古老的随州工作的人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的任务，就是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道德的树立，只有学习历史，进行“四有”教育，才能完成这一艰巨工作任务的。而我们将有关论文选编为《随州文物》出版，也就是为了达到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目的。

本书基本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宣传文物保护法，使其繁荣昌盛，开出鲜艳之花，结出丰硕之果。对此，向史学界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成果，表示衷心敬意。并诚恳地请求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对上述不妥之处，批评指正。

## 目 录

- 前言·····李文烈
- 曾国之谜·····李学勤
- 随国、曾国的秘奥·····顾铁符
- 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石 泉
- 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舒之梅 刘彬徽
- 有关曾侯乙墓的几个问题·····方酉生
- 随州历史悠久、文物极为丰富·····梁燕山
- 呼吁各界保护文物严格执行文物法

# 曾国之谜

李学勤

春秋战国时代的曾国的问题，学术界讨论已久。早在北宋时，今湖北省安陆县一带就发现过两件“曾侯钟”（即楚王禽（熊）章钟。楚王熊章即楚惠王）。一九三三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又出土过一对大型的曾姬壶。刘节先生在他的《寿县所出楚器考释》一文中，研究了钟、壶和另外几件曾器，正确地指出，曾不是古书中常见的姁姓郟国（在山东峰县东），而是一个姬姓诸侯国。他还认为，曾是附庸于郑国的，“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南阳，东抵睢州”，也就是在河南省的中南部。

一九六六年，一批上边有“曾侯仲子游父”铭文的春秋铜器，在湖北省京山县的苏家垅出土。随后几年，湖北随县、枣阳和河南南端的新野，连续掘获许多曾的铜器。这一系列的发现说明，曾人活动范围不象刘节所推测的在河南中南部，而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北限。

根据铜器分期知识分析，京山、随县、枣阳的器物，时代多为春秋前期，武汉文物商店征集的曾伯从琫鼎，年代还要早一点，大约在西周东周之际。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曾子游鼎，器主和京山的“曾侯仲子游父”是同一个人，观鼎的形制和锈色，无疑也是湖北出土的。枣阳出土的一件鼎和新野出土的一件鬲，器主都是“曾子仲海”，但新野的多数铜器是



春秋中期的。最近，在“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中，又展出了湖北襄阳地区征集的两件春秋中晚期曾国铜器。曾姬壶和楚王禽章钟是战国前期楚惠王时代的器物。由此可见，从春秋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姬姓的曾国始终是存在的。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大墓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曾国铜器出土地点与布图。

然而，在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古代文献里，却完全找不

到姬姓曾国的史料，特别是《左传》对汉水以东各小国以及楚国向该地区发展的情形，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但也没有“曾国”字样。《左传》所记载的淮汉之间诸侯国，如江、黄、邓、唐、厉等，多已在出土的铜器铭文里出现，只有这个曾国，铜器出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左传》中却似乎没有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我们认为，姬姓曾国不但在《左传》里有记载，而且有关的记事还很多，只不过书里的国名不叫做曾罢了。大家知道，当时有的诸侯国有两个国名，例如河南南阳附近的吕国又称为甫，山东安邱的州国又称为淳于。从种种理由推测，汉东地区的曾国，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随国。

大洪山以东有随、唐、厉三国，姬姓的随国最强，所以《左传》说“汉东之国随为大”。春秋前期，公元前七〇六年，楚武王伐随，随侯作好了准备，楚军不敢进攻。公元前七〇四年，楚再伐随，虽获胜利，但未能占领随国，只结盟而还。公元前六九〇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死于军中，由大臣们与随侯结盟。公元前六四〇年，随国又率领汉东诸侯叛楚。分析这一时期的形势，汉东小国境域能北至新野、南至京山、并与楚抗衡的，只有随国。

曾国决不是唐国、厉国。北宋末年，今湖北孝感地方出土过一组西周铜器，记载周昭王南征路线，经过唐、厉和曾。曾和唐、厉同时出现在一组铜器铭文中，证明曾不会是唐、厉。从各地曾器铭文看，京山、枣阳、新野几个地点的曾国墓葬，都是曾侯子弟的墓，只有一九七〇年湖北随县均川发现的一组铜器，器主“曾伯文”是曾国之君。最近发现的曾侯乙的墓又在随县附近。国君的墓葬应在其国都，而据文

献记载，随县正是随国国都的所在。

考察铜器铭文，知道曾国的历史相当长久。曾姬卣作于楚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四六三年），楚王禽章钟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四三三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汉东地区经过春秋之世不亡的，惟有随国。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评论说：“夫随之为国，限在方城内，于楚尤逼，而能屡抗楚锋，独为后亡。”战国初年汉水以东，如不是随国，那里还再有一国姬姓诸侯呢？

擂鼓墩大墓出土的楚王禽章钟上的铭文和北宋发现的两件钟上的铭文是相同的，都是：“佳（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禽（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时（持）用享。”按照铜器铭文的通例，“作某人宗彝”，是作祭祀该人的祭器，该人必然是已死的。“返自西阳”应解释为报（古代称报丧为报）自西阳，“反”、“报”两字古书中常常互相代用。“奠之于西阳”应读为奠之于西阳。整个铭文的意思是楚惠王五十六年，从西阳得到曾侯乙去世的讣告，惠王制作了曾侯乙宗庙所用的礼器，在西阳对他进行祭奠，并永远用于享祀。这个墓出土的竹简也记载墓主下葬时，楚、宋两国来会葬，楚国自王以下都馈赠了车马等物，可以同铭文互证。

楚惠王为何要作一套钟、铸放在曾国的宗庙里，恭敬地祭祀曾侯呢？当时楚国称霸一时，决不会轻易地对一个小诸侯国给予这么高的礼遇，但如果曾即是随，这个问题便不难解释了。

公元前五〇六年，吴国大军在孙武、伍子胥指挥下攻进楚国郢都，楚昭王（惠王的父亲）仓皇出走，逃亡到随国。

吴人尾追赶到，要求随君交出楚王，允许把汉水以东土地划归随国作为交换条件。哪时，楚昭王躲在随国公宫以北，吴军进抵公宫以南，局势已极危急。随军不顾吴国的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楚王，终于赢得了时间，楚昭王在秦军帮助下，恢复了楚国。此后《春秋》一书中又出现了“随侯”的名号。对此，杜预注：“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即中原各国）。吴之入楚，昭王奔随，随人免之，卒复楚国。楚人德之，使列于诸侯。”估计曾侯乙就是保护了楚昭王的随军后裔，楚惠王铸编钟来祭享他，正是报德之意。

曾即随，某些铜器的铭文还可以证明。京山出土的铜器中有两件西周晚期的簠，铭文是：

“惟正二月既死霸壬戌，崑乎作宝簠，用敬夙夜，用享孝皇祖父考，用丐眉寿永命，乎其万年永用。束。”崑乎应该是曾侯的先世，“崑”字从“它”声，古音和“随”字十分相近，可相通假。这是曾也可以称为崑（随）的又一证据。

资料来源：《文物与考古》92期

## 随国、曾侯的秘奥

顾 铁 符 (故序)

1978年初夏，为了参观湖北省随县西北郊擂鼓墩一座战国墓的发掘，在随县呆了近两个月；看了从揭开第一块椁盖板起，到墓坑里的东西都取出来的全部过程。对这座墓总的印象是：“内容非常丰富，收获很大，但带来的问题也真不少。”对这新出来的一大堆问题，各科学部门除了各自注意他自己的有关问题之外，在历史考古学界，对“随国与曾侯”当然是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随县是周代随国的故地，随国最后的消失，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但一般的看法是：可能在进入战国之后不久，被楚灭掉的。所以当这座大墓发出的消息传出来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如果是春秋时代的话，就是随墓；要是到战国的话，就又是一座楚墓。”说实在的，我也是带着这样的想法，而赶到随县去的。在这座墓的发掘中，告诉了我们两个事实：一、这座墓规模很大，葬具坚实厚重，随葬品气派大、数量多、制做精美。铜器中有上百件上面有“曾侯乙文……”的铭文，所以是一座诸侯墓；墓主是曾侯，名乙。二、墓里随葬品中，有一件和北宋时在安陆出土，铭文完全相同的楚王鬲章钟，这都是楚惠王为这座墓的墓主曾侯乙制的。所以曾侯乙的死不可能早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

443年），如果结合墓里的其他随葬品等来看，这座墓的年代，也未必会晚于战国早期。

这些新的资料，虽然对墓的年代，墓主的身份与姓名等，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出乎意料地又出现了一个“曾侯乙”。这个曾侯和随国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自从这个问题发生之后，在历史考古学界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据湖北省博物馆了解，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看法<sup>①</sup>：一、“战国初期，楚国早已称霸，这一带都是楚国的范围。因此楚国不可能在自己范围内，“…还允许存在一个强大的曾国，这个曾国，不是历史上的曾国，只能是楚的与国，“…楚封的王公贵族；因此，这墓实际就是楚墓。”二、“曾就是曾，随就是随，其所以从文献上找不到这一带有曾，那只是文献“…有遗漏。”三、“曾即是随，如果把曾释为随，这样来看历年出土的曾国铜器，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有些问题也比较好理解。”

第一种看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肯定这座墓是楚墓。在当时的许多国里，属于楚人血统的，只有一个夔国，可是它早在楚成王三十八年，已经被楚国灭掉了。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座楚国的封君的墓。对这个看法是否有道理，关键就在这个墓里是不是有楚墓的特征。随国到春秋战国之际虽然还存在，可是和楚国相比，已经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个孤岛，四面都在楚国包围之中。所以如文化艺术，受楚国的影响比哪一国的都深。物质、技术方面，可能要靠楚国的支援，经济对楚有很大依赖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在这座墓里，有不少的随葬品，以及上面的文字等，有相当浓厚的楚国风格；所以使人看了眼花缭乱，还真象一座

楚墓似的。但是还应当记住随是古老的姬姓国，既和楚终究是不同历史渊源的两个国，除了经济文化等受一点三同影的影响之外，还有截然不同的一方面，就是传统的礼制和风俗习惯等，保持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性。现在就着重在这一方面，和相仿时代用的楚墓作些比较。

一、墓坑 这座墓的位置是在一座小山的正中，这座山的地层是风化得很严重的红砂岩，墓坑就是在红砂岩退潮出来的，所以是山地岩坑的墓穴。江陵楚墓所在地的地名，虽然常常有带“山”字的，如纪山、两台山、拍马山……等，但墓实际全在平地上，最多有点坡度而已，所以都是土坑。只有八岭山那里，有一部分是在主山上，但这一带的墓坑发掘得很少，究竟有没有岩坑墓还不知道。此外如长沙、常德楚墓，也和江陵一般的墓一样，都是平地土坑。

二、墓道 这一座墓到发掘时，虽然挖土炸石，地面已经削去了六、七米，但下面离开地面还有四米上下，从墓坑四面的墓壁来看，确乎没有墓道的痕迹。楚墓虽然不是都有墓道，但只要稍微大一些的，就都有墓道。这座墓比过去三十年里发掘的任何一座楚墓都大得多，就比最大的天星观一号墓，信阳长台关一号墓，也要大上好几倍，但是一座没有墓道的竖穴墓。这亦是和楚墓在制度上很显著的一个区别②。

三、保护层 这座墓做在木椁外面与一般填土所需五花土之间的保护层是，紧贴棺盖敷铺一层10—30厘米厚的木炭，木炭之上是一层10—80厘米厚青灰色的白膏泥（即陶土），再上是用黄褐土和青灰泥（每层厚约15—20厘米）相同，总厚约2.5米厚的夯土层。在夯土层上面，又铺一层长约1.5—2.5米，宽约0.8—1.5米，厚约0.2—2.5米，包括花

岗岩、板岩、页岩、砂岩、闪绿岩……等石质的石板。在木椁四周的空隙间，用一层约20厘米厚的白膏泥，和一层约50厘米厚的木炭相间，一直到填满为止。墓葬里木椁外面保护层的做法，从各地发掘所见的情况来看，在战国墓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楚墓里最常见的，就是填白膏泥（青灰泥可能是白膏泥的代用品）。另一种是《吕氏春秋》所说的“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就是填石块和木炭。这两种做法在我国南北各地，含水量不同的土层里，各自起一定的保护作用。但这座墓的保护层，既不是江陵、长沙等地楚国流行的填白膏泥，也不是在辉县、汲县等地所见到的“积石积炭”。而是混合运用了南方和北方的两种做法。

四、木椁 这一座墓的木椁是由中、东、西、北四个室构成，每个室的大小各不相同，总平面成为左右不对称的直角多边形。因为它是南几个室拼凑起来的，所以结构只可以是单元组合型的。至于这四个室，中室最大，放的是礼乐器，作为厅堂布置的。东室略小于中室，放的是主棺及八具殉葬棺和一具殉棺，此外还有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是作为上房及内宴的地方布置的。西室第三，放十三具殉葬棺，是作为奴婢居生的所谓下房安排的。北室最小，放的是车、马、兵、乐器，是储藏室。从整个布置来看，是参照人们生前生活方式而设计的。楚的木椁墓都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箱子，在中间隔成若干个室，以正中最主要的室为棺室，棺室之外的室分别安放各种随葬品。就是江陵、信阳几座最大的墓，亦都是照这个原则安排的。所以，随县这座墓的木椁，和所有楚的木椁无论从形势结构，以及整个设计，都没有相同之



处。

五、棺 这座墓的棺（包括主棺及殉葬棺），主要有三种形式：如主棺，盖及左右墙略带弧形，盖左右两边成尾角，基本平底；棺内没有零床。殉葬棺中除了这种形势的棺之外，还有盖及左右墙成平直，与成弧形的两种，也基本上都是平底。江陵楚墓的棺，绝大多数是盖和墙成弧形及平直两种，但底都是悬起的，上面距盖和下面高地为二与一之比。底除了嵌入四周墙里之外，另加两根横档托住。和这座墓所出的棺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有平底与悬底之分。长沙等地的棺是六面平直。

六、外棺 这座墓的主棺是内外两重，外棺长3.17米，宽1.96米，高2.14米。是以铜铸成框架，与身盖合合缝处的扣，及底下的是，再镶上木板，漆彩绘而成。上面是棺盖，下面是棺身，是靠子口合拢的一只巨大箱子。估计它单是铜的部分，就重达三至四吨。这种外棺在考古发掘中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传说早于这座墓六十多年，吴王阖闾死后，以及晚于这座墓近五十年，田齐太公子和死后，都是用“铜椁”下葬的；不知和这一具外棺有没有相似之处。楚墓里发掘到内外两重棺的不多，据我所见到的只有信阳长台关一号墓，他的外棺是一具盖和墙成弧形的木棺，不过比较大些而已。

七、厌胜 厌胜是属于迷信范围之内的一种风俗习惯。在江陵一带的楚墓里，只要是规模比较大一些的，就常常放有一种木雕的偶像，如镇墓兽、虎座飞鸟等。意思是让它在墓里驱逐恶鬼，起拔除不祥的作用的。但在随县的这座墓里，就见不到带有厌胜作用的器物。在东室里有一只头上铸